

# 革命文物厚植红色情怀

赵 珊

一物胜千言，睹物思历史。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，展示着革命斗争的感人事迹，传承着催人奋进的红色基因。

在四川邛崃，泛黄的苏维埃布币把人们带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，它凝聚着红军的坚韧、无私和无畏，更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一家亲血肉相连。

在贵州的四渡赤水纪念馆，三扇多处修补的普通门板诉说着一段不普通的红色

历史。它们是军民鱼水情的最佳诠释，更是革命老区群众爱党拥军传承红色基因的体现。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，一对长征中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，讲述着“红色华佗”傅连璋在炮火连天中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。医疗器械是他的强大武器，傅连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一生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指出，革命文物承载

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，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、激发爱国热情、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。

人无精神则不立，国无精神则不强。革命文物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见证者，所蕴含的红色精神是激发红色情怀的营养剂。一幅幅历史照片，一件件珍贵实物，革命文物让我们的精神受到洗礼。100年风雨兼程，100年砥砺前行，从一叶小舟

到中国巨轮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破浪前行。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、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、无畏拼搏的奋斗精神，厚植出中华民族的红色情怀。

红色情怀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，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变，唯有不忘初心，方可告慰历史、告慰先烈，方可赢得民心、赢得时代。我们不仅要瞻仰革命文物，接受红色洗礼，更要让革命文物“活”在心中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，汲取前进的不竭动力，继续砥砺前行、扬帆远航。



国家文物局特别支持



四渡赤水纪念馆的红军门板



## 红军门板 鱼水情深

曹行燕

每一件革命文物，都是我们党光辉历史的见证；每一个革命故事，都诠释着一种精神、凝聚着一种力量。让我们走近革命文物，回顾四渡赤水那段烽火岁月……

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展柜里，陈列着三扇年代久远的木质门板，一对为正门门

板，一扇为厨房门板，正门的两扇门板呈深褐色，有多处修补，且长短不一。

这三扇看似普通的门板，确是国家一级文物，也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这三扇门板究竟有何特别之处？故事要从86年前说起。

1935年1月24日，中央红军击溃黔军，进占贵州省土城镇。老乡们听信了地方反动武装的谣言，大多吓得躲进了山里。

第二天，镇上响起锣声与喊声：“老乡们，快到盐仓分盐呀！”船工郑明福心想，分盐？哪有这等好事！他半信半疑地来到

土城盐号，看见红军用盐梭标戳开盐包，再把一坨坨的盐巴敲碎递给乡亲。郑明福亲眼看到马帮的汤连成、抬滑竿的姜春山都领到了盐。

他怯生生地上前问道：“我，我可以领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”，说着，红军将碗口般大小的一坨盐，递到郑明福手上。郑明福双手捧着盐，激动得讲不出话来，心里却默默记下了红军这份恩情。

红军在土城纪律严明，开仓分盐、分粮给“干人”（贵州方言，穷人的意思）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外出躲藏的百姓又纷纷回到镇上。

不料，国民党军紧追而来，与红军在土城青杠坡展开激战。军情万分危急，朱德总司令亲上火线指挥，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，作出主动撤出战斗、西渡赤水河的决定。

如何在赤水河上快速架设起三座浮桥，成为中央红军是否能顺利摆脱危机的关键。周恩来亲自考察架桥点，红军四处寻找架桥材料。土城百姓闻讯后，纷纷卸下了自家的门板，找来木料，扛到河边，帮助红军搭建浮桥。

但是，赤水河水流湍急，几次眼看要成功了，浮桥又被激流冲散。郑明福见状，毫不犹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，同红军战士一起往返数次，才将连接的船只牢牢固定。确保了中央红军1月29日凌晨顺利渡过赤水河，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，从这里拉开序幕。

为防止敌军追击，红军决定迅速将浮桥炸毁。“上门板”本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期版本的规定，但由于战事紧急，红军来不及归还老乡的门板和木材，便给了远超过市价的银元和物品作为补偿。船工郑明福得到了两块银元、一领蓑衣、一个斗笠和一根扁担。红军走后，郑明福和老乡们把被炸毁的门板打捞起来，因受损严重，早已分不清门板是谁家的，

便各自抬回家中，修修补补继续使用。其中，郑明福家这三扇门长短不一的门板，他不知修了多少次，也舍不得换，而且一用就是71年。

四渡赤水纪念馆建馆时，郑明福的后代郑月成把这三扇门板捐给纪念馆。像郑明福家这样的门板，土城人民亲切地称为“红军门板”。

红军门板，鱼水情深。这三扇门板，不仅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历史见证，也是军民鱼水情的最佳诠释，更是革命老区群众爱党拥军传承红色基因的体现。透过革命文物“红军门板”，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铁的纪律，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的鱼水情谊。

(作者系四渡赤水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)

配图：四渡赤水战役画作



洗眼杯

徐老这里知道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，他不禁感叹：“可惜我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不然也要革命一番。”徐特立告诉他，“干革命哪有岁数之分？我51岁才加入共产党。现在正是做事业的时候啊！”傅连璋深受触动和启发。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他说：“我在大革命以前，曾经觉得人生很苦恼……我把这些为革命流血的伤员医好了，也把自己的苦恼医好了。”这个曾相信上帝救人、治病救国的医生豁然开朗，心中燃起革命的火苗。

被任命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军医务学校校长。1934年4月，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，傅连璋又被任命为院长。1934年10月，在他的坚决要求下，被批准带病参加长征。根据时间和任务的要求，傅连璋整理出必备的药品和器具，洗眼杯和量杯就是其随身携带和使用的器具之一。

在漫漫长征路上，瘦弱的傅连璋历尽艰险，却始终坚守自己的职责。每当大家扎营休息，他却忙着利用这些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

## 苏维埃布币见证历史

倪海宁

人们常见的货币有纸币、金属币，但您听说过用布做的钱币吗？而且是红军用过的布币。2016年10月22日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《我有传家宝》节目中，来自四川邛崃的刘兴福，带来了6张印有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”等字样的苏维埃布币。今天，在邛崃市长征纪念馆中，这种已泛黄的布币，共收藏有40多张。这些布币背后，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？

布币背后的鱼水情深

这6张布币，票面纵15厘米，横8厘米，直式，黑色油墨石印。布币上端横书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11字，其下呈弧形排列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”8字，再下为“工农银行”4字，中间有一颗单线连成的大五角星，星中一拳头。拳头向下，星外有交叉的镰刀、斧头。刀尖、斧刃向上，围绕五角星。在布币五角星下面，从右至左横书“叁串”2字，表示布币面值。“叁串”是按照当时四川流通的中间有孔的铜板为计量单位，“壹串”约10个铜钱，“叁串”等值于30个铜钱。

这些布币的最初收藏者，是刘兴福已过世多年的父亲刘代春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刘代春在邛崃街上卖猪肉。1935年秋至1936年春，红军驻扎邛崃时，司务长每到期，总要去刘代春的肉摊买猪肉，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布币。刘代春感念于红军解放穷苦百姓，本想将猪肉赠与红军，但红军军纪严明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坚持要按市价支付。几番僵持之下，刘代春收下了这些布币。红军前后使用布币45张，面额总计数千元，共购买刘代春约300斤猪肉。

红军离开邛崃时，特意告诉刘代春：等到新中国成立了，可将布币拿到当地政府换取流通货币。此后，刘代春把布币小心翼翼地包好，夹在



苏维埃布币

三字经》里，藏到自家房梁下。革命战争年代，无论多苦多难，他始终精心收藏着这些布币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也从未舍得拿去换钱。

直到1981年，已是80多岁高龄的刘代春，才把这些虽然泛黄、却丝毫未损的布币，全部捐献给邛崃市博物馆，以教育更多的后代铭记红军精神。邛崃市人民政府依照当年红军的承诺，给他兑换了300元钱。这在当年是不小的金额。

川陕苏区辉煌的见证

经考证，这些诞生于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布币，出自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的造币厂。

1932年12月，从鄂豫皖转移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主力，创建了川陕

革命根据地。根据地全盛时期，总面积约4.2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500多万，有县级苏维埃政权20多个，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重要红色政权。1933年11月18日，为广泛开展土地革命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红四方面军造币厂（又称“川陕省造币厂”）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，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（即后勤部）部长、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的郑义斋兼任。

1933年6月，红军从陕南购回大批纸张、颜料、油墨、布匹等物资，开始印刷纸币和布币。其中，布币常用粗、细白布，阴丹士林布，毛蓝布和草灰色布等布料印制，票面有壹串、贰串、叁串、拾串和壹圆5种。纸币常用道林纸印制，票面有一串、两串、三串3种。布币主要在根据地内部流通，纸币则多用于外部流通。

1934年春，因反“六路围攻”收紧阵地，为了躲避敌机轰炸，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迁移至通江县得汉城，继续印制纸、布币。据统计，造币厂在川陕苏区时期，共印制布币140万元，纸币60万元。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，造币机器愈加先进，技术趋向成熟，布币在造币厂迁移至得汉城后就停止了制造，纸币在制造和流通中日趋占据主要地位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中，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是最具规模的，它对于根据地统一币制、活跃金融、稳定物价、促进贸易、发展工农业生产、改善人民生活乃至巩固红色政权，均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邛崃，除布币外，红军遗物还有很多。它们共同凝聚着红军的坚韧、无私和无畏，更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一家亲血肉相连！

(作者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师)  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## “红色华佗”的洗眼杯和量杯

于 非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一隅，静静地摆放着一对长征中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。

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175位将领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其中有一位开国中将极为特别，他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虽从未杀敌，却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他叫傅连璋。

这对洗眼杯和量杯，正是傅连璋在红军官兵危难之时救死扶伤的历史见证。

1894年，傅连璋出生于福建长汀一个基督徒家庭。他深受基督教影响，希望上帝能够救世救人。1915年，傅连璋被聘为汀州福音医院医生，1925年被推举为院长。

1927年，南昌起义爆发。有两位共产党员找到傅连璋，请他救治300多名负伤官兵。傅连璋虽不了解革命，却一口答应，立刻筹款成立“合组医院”，夜以继日抢救伤员。就是在这里，他为身负重伤的陈庚保住了腿，悉心照料高烧不退的徐特立，同时也感受到共产党员的乐观与坚守。徐特立病势渐缓后与傅连璋交谈起来，傅连璋从



量杯

工具，为负伤的战友手术、包扎，教大家防病方法。过草地时，他还举办了一个医疗培训班，白天行军，晚上上课。红军一路上条件恶劣，饱受疾病威胁，正是由于傅连璋的及时救治和精心保障，许多人的生命得以挽救，毛泽东亲切地称他“红色华佗”。

周恩来曾在一次偷袭中救下手足无措的傅连璋，告诉傅连璋：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，现在是“秀才当了兵，学会打冲锋”，傅连璋最后还是没学会打冲锋。他曾说：“我以终身从事于革命医务工作为极大快慰，我热爱医务技术这个武器。”虽然他不会用枪，却始终紧紧握住住行医救人这个强大武器，为新中国打下一片天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。

今天，当我们再看到这些医疗器具时，深感普通的它们有着不普通的内涵。傅连璋为部队的医疗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同样，随他走过艰难历程的医疗器具也同样是革命胜利的功臣。

(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)